

对话意识·文本细读·当下关怀

——论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

陈茂林 陈韵祎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外国文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我们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外国文学研究在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化创新是国家、民族存在和发展之魂。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如何从事和创新外国文学研究,树立文化自信,从而为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创新和繁荣,为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做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就要具备与国内外学界的深度对话意识,进行文本细读,观照并关怀自然、社会和人生。这是外国文学研究创新的关键。

关键词:外国文学;创新;文化自信;对话意识;文本细读;当下关怀

中图分类号:II-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1-0065-05

0 引言

外国文学是人类文化最集中、最生动的表达形式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他山之石”,是我们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我国正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在这一奋斗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盛固然非常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们国家的文化战略发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弘扬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精华,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树立新的国家形象;二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尤其是那些承载着丰富人文精神的优秀文化”(刘意青等,2012:5)。外国文学研究在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化创新是国家、民族存在和发展之魂。复兴中国文化,就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复兴中国文化,还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文明成果。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如何从事和创新外国文学研究,树立文化自信,从而为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创新和繁荣,为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做贡献就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创新?笔者认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就要具备与国内外学界的对话意识,进行文本细读,观照并关怀自然、社会和人生。这是外国文学研究创新的关键。

1 对话意识

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创新?首先,要创新外国文学研究,就要有“对话意识”,要认真、细致地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国内外学术界展开对话,尤其要与外国的学术同行乃至权威进行深度对话。研究意味着解决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就首先要发现问题,找准问题,这是一切研究的基本前提。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必须要有鲜明的、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只有在同国内外同行开展深度对话的基础上,才能够发现研究的问题。所以,“对话意识”至关重要,无论是申报项目,还是写作论文,与学界充分对话始终是研究的起点或切入点。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李公昭教授的专著《美国战争小说史论》,就首先对国外的美国战争小说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与国外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罗伯特·拉夫立的

收稿日期:2019-10-25

作者简介:陈茂林,男,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陈韵祎,女,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小说研究。

《小说打内战》,斯坦利·库柏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战争小说》,约瑟夫·沃德梅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争小说》,韦恩·查尔斯·米勒的《武装的美国:小说中的面目:美国军事小说史》,丹尼尔·艾伦的《未写过的战争》,彼得·琼斯的《战争与小说家:评价美国战争小说》,杰弗里·沃什的《美国战争文学:1914到越南》等学术专著展开了对话,发现“作为对美国战争小说的整体把握来说,这些史论往往因过于疏略而缺乏广度和深度。个别重要时期的战争小说,如独立战争的小说、朝鲜战争小说等;一些重要主题,如对朝鲜战争小说的评价;一些重要战争小说家……或避而不提,或一笔带过,其结果是这类史论在表述美国战争小说的全貌时残缺不全。至今似无一部兼断代史的深度与编年史的广度为一身的美国战争小说史”(李公昭,2012:7),由此确立了本书的立足点,为本书的学术价值奠定了基础。

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不但要与国外学术界对话,而且要与国内学术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曾获全国第六届高等学校优秀成果三等奖的殷企平教授的专著《推敲“进步”话语》第八章,首先与国外批评家林纳德对话,发现林氏在分析特罗洛普的《尤斯蒂斯钻石》对“进步”话语的质疑时,认为丽萃“在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商品,又是消费者”,但却否认作品对丽萃如何扮演该角色的描写“构成对19世纪商品文化所依赖的价值观的挑战”,“仅仅挑战了阻碍丽萃消费能力的19世纪社会习俗和文化代码”(Lindner, 2003: 87)。接着,殷教授与国内学术界的代表朱虹女士展开学术对话,发现朱女士认为“丽萃确实是由现实丑变成艺术美的一个典范”,但却对于“为什么丑陋的丽萃同时又是艺术美的典范”未加论证。在此基础上,殷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出“《尤斯蒂斯钻石》中关于丽萃的双重角色及其所作所为的客观描述本身就是对19世纪新兴商品文化的强烈挑战,就是对这一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观的强烈质疑”(殷企平,2009:208-209)的结论。

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不仅仅需要与国内外学术界对话,尤其需要与外国的研究专家乃至学术权威进行深度对话。毕竟我们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无法彻底摆脱语言文化的障碍,一般来说,我们的研究相对滞后于外国学者。外国专家或学术权威的观点往往具有代表性,并影响深远,难以突破,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并非就注定落后。只要国内学者敢于同外国学术权威开展深度对话,鼓起学术勇气,挑战、质疑外国的权威,并找出其研究的不足之处,就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殷教授的《推敲“进步”话语》就表现出超常的学术胆略,敢于挑战国外的权威。该书第12章,论证并肯定了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斯密》对质疑“进步”话语的贡献。以英国当代文学界权威伊格尔顿为代表的国外评论家一直忽视《亚当·斯密》推敲“进步”的主题,认为该作品是一项绝妙的“霸权课题”,“艾略特小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英国新兴统治阶级的霸权,即打着道德教诲的幌子来麻痹英国劳动阶级的斗争意志,并说服后者认同官方推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殷企平,2009:309)。这已经形成西方评论界的两种思维定式,要么把小说看作“田园生活方式的挽歌”,要么看作“英国统治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产物”(殷企平,2009:23)。针对伊氏的观点,通过仔细研读文本,殷教授提出了与西方权威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艾略特恰恰奏出了霸权主旋律的反调,奏出了一组质疑‘进步’,质疑速度,质疑‘现金联结’的音律”(2009:310)。该书第一章,是针对英国文学评论界的另一位权威威廉斯有关迪斯累里的观点而展开的论述。殷教授认为,“威廉斯所开列的‘新型小说家’的名单并没有把迪斯累里包括在内——在威廉斯看来,是狄更斯首先捕捉到了工业革命引起的问题意识,发现并清晰有力地勾画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情感结构”(2009:18)。针对威氏的观点,殷教授对迪斯累里的相关作品进行了细读,并得出了与威廉斯认为狄更斯的小说率先推敲了“进步”话语迥然不同的结论,认为小说家迪斯累里最大的贡献就是“率先用小说书写了一部‘进步’推敲史”(2009:33)。我们知道,伊格尔顿和威廉斯都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威廉斯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丰富和拓展了威廉斯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意识形态”是伊氏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贯穿其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两人都是英国文学界的学术权威,而殷教授不惧权威,展开与权威的深度对话,通过文本细读,得出了新颖的结论。

2 文本细读

对话意识是外国文学研究和创新的起点,是确定研究问题或者选题的依据,是问题意识的前提。通过与国内外学界的深度对话确定研究问题后,下一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了,即如何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才能出新。笔者认为,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创新的关键环节。文本细读是研究文学的一项基本技能,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其主要特点是“确立文本的主体性”,是一种强调内部研究的“文本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流派,“新批评细读逐渐体系化和制度化”(张剑,2006:630)。文本细读强调文学研究立足文本,让文本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张文学研究应该从文本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到文本,更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目前在我国学界的文学研究中,依然存在着重视理论、轻视文本的倾向,研究自始至终从理论到理论,根本看不到文本的影子,用宏大的理论吓唬人,得出假大空的结论。这种批评模式“从某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解读……经常出现对理论生搬硬套或者把理论与作品强行撮合的现象。不少研究者对理论囫圇吞枣,食而不化,用之于作品解读时,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对具体问题的阐发或失之粗疏,或以偏概全,甚至还出现了有违学术规范与涉嫌抄袭的现象”(张和龙,2013:95)。这种研究方法使文学作品沦落为文学理论的工具,“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失去了它应有的首要地位,沦落为理论的附庸,实为本末倒置。作品本身的分析过程,已经不再有趣,因为它必然通向预设的理论观点”(殷企平,2002:66)。这种批评可被称为“印证式批评”,其死搬硬套的致命弱点清晰可见,正如殷企平教授所说,“那种一味用具体作品来印证某种理论的文学批评论著大都有一个弱点:人们不用看完全文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论”(殷企平等,2011:66)。目前,很多院校的研究生论文开题和写作中,这种偏重理论的倾向相当严重,似乎没有文学理论,开题就不能通过,论文就没法写作。其结果是对理论严重依赖,理论束缚了文本分析,受理论限制而预设的结论束缚了研究者的思想表达,严重冲淡了文学研究必须具备的“问题意识”,不要说创新不可能,甚至还使文本分析和阐释脱离文学研究的学科轨道,问题更加严重。正如张和龙教授所说,“不可否认,外来理论的引入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源,但是外来理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文学语境,脱离了具体作品的阐释行为,就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当文学作品中的细节只是外来理论的印证材料,文学也就变成了脱离文学语境的‘文化研究’,或社会学研究,或心理学研究,成了其他学科研究的附庸和下脚料”(张和龙,2013:98)。

曾获第十八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吴笛教授的专著《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是文本细读的典范。该书深入、细致地解读、阐释了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十几位玄学派诗人的近百首诗歌,达到了论据确凿、论证充分的学术效果。曾有专家这样评论,“该成果突出的特色是,作者能够紧扣文本,细读字里行间的意义,作为文学评论的方法也好,作为一种务实、严谨的读书方法也好,在世风浮夸的今天,具有伦理学意义”(吴笛,2013:314)。文本细读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聂珍钊教授评论道,“细腻的文本分析遍及全书,体现了作者不仅具有学理分析能力,而且具有敏锐而强大的文学感悟力。大量诗歌文本的阅读、翻译和细致分析,使得本书的理论阐发有理有据,言之凿凿”(2014:170)。殷企平教授的《推敲进步话语》也是文本细读的典范,第十章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谢莉》对“进步”话语的质疑进行了解读。从问世起,评论界对该小说的评论就毁誉参半,“对它的指责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提出的批评,而是从艺术角度进行的抨击”(2009:257)。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英国文学批评界的两大权威:伊格尔顿和刘易斯。殷教授不怕权威,与外国评论界的两个“大腕”进行深度对话,发现其观点有失公允,然后立足文本,沿着作品对“进步”话语的解构这一研究主线,对“小说结尾部分的语言、文体、意象——尤其是‘巴比伦通天塔’意象——和叙事策略/声音进行了细察”(2009:22),得出了《谢莉》是一部毫不逊色的质疑“进步”的力作的结论。这些外国文学专家立足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告诉我们:要创新外国文学研究,就要与学界深度对话,不怕学界权威观点,立足文本,扎扎实实地进行文学阐释和探讨,不能让文艺理论主宰文学作品解读,不能让文本解读沦为文艺理论的附庸。要凸显“问题意识”,围绕研究问题和研究主线,让文艺理论服从并服务于我们的文本阐释,让文本阐释服从并服务于论证我们的研究问题。一定要让文本“唱主角”,一切要为“论证

研究问题”服务。这样才能达到论证充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说服力强,结论令人信服的效果,才能够看到不同的东西,得出不同的结论,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3 当下关怀

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不但要与国内外学术界深度对话,不但要进行扎实的文本研究,还要有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对当下的现实关怀,使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现实关怀依然根源于“问题意识”。依笔者之见,“问题意识”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在与国内外学界深度对话基础上发现的学术问题,二是来自我们作为人文学者观照现实所发现的自然生态、现实社会和人类精神领域存在的问题。两个问题并不一定总是重合,但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重合的,这样就能使我们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要做到学术探讨和现实观照并重,我们首先要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因为我们是研究外国文学和文化的,但我们是中国的学者;我们不能站在外国研究者的立场上,纯粹研究外国的学术,丧失我们的立场。刘建军教授指出:“把外国的理论、外国的观点、外国的想法直接拿过来,然后说外国多厉害,外国多好,外国研究多前沿;完全介绍西方,或者用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事,用中国经验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或深刻;这些都是丧失立场的表现。作为中国研究者,我们不能成为外国理论和外国话语的注释者,而应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让它为我们服务。”(翟乃海,2018:4)李公昭教授的《美国战争小说史论》就具有清晰、坚定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该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中国当代学者的角度去审视与研究美国的战争历史与战争文学,并试图对美国各时期战争小说中所表现的历史事实、战争观念、军事思想、社会矛盾、艺术成就等作尽可能全面、深入的论述,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论与评价”(李公昭,2012:8)。在选取研究对象时,李教授参考了国外研究“美国战争小说”有影响力的评论家的选材标准,但却不是照搬,而是立足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现实关怀,同中有异:切入角度和研究都与国外研究者不同;选取了一些“代表不同观点、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作家与作品进行论述”,力争透视美国战争小说的全貌,“如在评介美国独立战争小说时不仅选取19世纪歌颂北美殖民地人民英勇抗击英军,歌颂华盛顿英明、伟大的《间谍》《自由之枪》等作品,也选取20世纪抨击殖民地军民贪生怕死、见利忘义、临阵脱逃的耻辱行为,甚至抨击大陆军高级将领、当时的美国国会,乃至华盛顿本人的《不可战胜的人》《武装的暴民》”(李公昭,2012:8)等作品。在解读具体文本时,该书摆脱了国外学者乃至权威的学术影响,绝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没有套用文艺理论,而是文本细读更加扎实,弥补了国外学界研究的不足,坚持了为我所用、为我服务的立场。正如刘建军教授所说:“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外国语言研究、外国历史研究、外国哲学研究等,首先要讲的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说到底,研究应该是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去证明外国的理论有多么强大”(翟乃海,2018:4)。

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我们还要有当下关怀。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就体现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当下关怀。他研究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个学术问题,同时观照着中国的社会现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缺失已造成严重后果,市场价值代替了伦理价值,“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之下,追求市场经济利益似乎变成了文学家、文学出版商和批评家结合在一起的强有力的纽带,出版商的码洋、销售排行榜等,似乎成了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为了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某些人把文学教诲的道德责任放在一边,一味描写感官享乐和对物质欲望的追逐,精神食粮的文学变成了物质食粮,文学的出版似乎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聂珍钊,2014:4)。他对当下中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过快而产生的问题忧心忡忡:“如果文学为了赚取金钱而一心信仰厚黑之学、权术之道、金钱万能,社会岂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气?官场岂能清廉?法律岂能公正?”(聂珍钊,2014:4)他强烈呼吁,文学批评绝不能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学“要为建设良好的道德风尚服务……要促进我国民族文学的繁荣,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家园的责任,为把美好的中国梦变成中国的现实而服务”(聂珍钊,2014:4-5)。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研究者应有的当下关怀:研究学术,关注社会和人生;研究外国,观照中国;研究过去,关心当今世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

实意义。

4 结语

综上所述,外国文学研究要创新,就要具备对话意识,尤其与国内外学界同行乃至外国权威评论家展开深度对话,才能找到研究问题,找到研究的起点或切入点;确定研究问题后,要进行文本细读,立足文本,围绕研究问题,紧扣研究主线,分析、阐释文本,让文本成为主体,而不要沦为文艺理论的附庸,让理论服从服务于我们的文学研究,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外国文学研究要创新,还要坚守中国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坚持为我所用、为我服务的立场,秉持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研究学术,关注自然、社会与人生,关怀当下现实。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好地介绍、研究外国文学、文化,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为中国文化强国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 Lindner, Christoph. 2003. *Fictions of Commodity Culture: From the Victorian to the Postmodern* [M].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李公昭. 2012. 美国战争小说史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意青,邹赞,聂风芝. 2012. 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J]. 社会科学家(4): 3-7.
-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聂珍钊. 2014. 智慧文学的智慧诠释——评《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J]. 中文学术前沿(1):167-170.
- 吴笛. 2013. 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殷企平. 2009. 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殷企平. 2002. 由《黑暗的心脏》引出的话题[J]. 外国文学(3): 62-68.
- 殷企平,杨世真. 2011. 新中国60年狄更斯研究之考察与分析[J]. 外国文学研究(4): 60-69.
- 张剑. 2006. 细读[G]//赵一凡,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630-640.
- 张和龙. 2013. 理论如何运用?[J]. 外语研究(1): 95-100.
- 翟乃海. 2018. 新时代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刘建军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2): 3-9.

Dialogue Awareness, Close Reading, and Solicitude for Present: On Innov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CHEN Maolin CHEN Yunyi

Abstract: Foreign literature is the cultural quintessence of each nation in the world,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hrough which we learn advanced foreign culture.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and prospering Chinese socialist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ach nation and country. Therefore it maintain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iterary scholars to innovate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and 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hence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strength. To innovate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we must have an awareness of deep dialogue with academic circl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arry out textual close reading, and show solicitude for nature, society and life. These three aspects are the key of the originality of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innov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dialogue awareness; textual closerreading; solicitude for the present

责任编辑:肖谊